



论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

■石敏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伊格尔顿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引导下，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逐渐凸显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批评策略。他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出发，将“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两种范式相结合，提出了新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的解释模式。在具体分析中，伊格尔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放置在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场域中进行研究，力图在揭示文学作品内容和结构的同时，映射出意识形态所隐藏的政治权力斗争。

【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生产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24)07-0095-06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24.07.015

作为英语世界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总体上看，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主张，文学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文学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及其利益的合法化；文学意识形态一般通过普遍化、自然化等手段来实现权力的合法化。正是在这些关键点上，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姿态。然而，相较于多数理论家，伊格尔顿并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起点展开研究，而是从被“忽略”的马克思的文学作品出发来考察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并将这种关联延伸至广泛的文学领域。这显示出伊格尔顿独特的研究路径。在考察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关系时，伊格尔顿将“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视为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两大基本范式，并通过澄明二者在社会历史和物质生产中的统一来揭示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政治文化批判功

能。本文以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从“文学生产”到“意识形态批评”的伊格尔顿思想的发展脉络，总结出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的生成逻辑

伊格尔顿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中，不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自我认知都带有一种盲目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就是将这种盲目性揭露出来。例如，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虽然称赞了《济金根》剧本的结构和情节，但同时拉萨尔过度关注修辞、韵律而忽视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批评。马克思说：“现在来谈谈不足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对这种疏忽感到多么震惊，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1]“如果

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处理得比较随意，而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2]马克思借由给拉萨尔的回信，对那些只追求修辞和韵律的形式主义文学做派提出批评意见，指出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没有体现出阶级力量产生的根源，反而遮蔽了文学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在伊格尔顿看来，正是像拉萨尔一样的文学创作者的这种盲目性和无意识性影响了文本叙述风格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反对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但却认为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无一不受到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十分隐晦，整个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文学生态，批评者需越过创作者的盲目性才能揭露文本背后的真实意义。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创作者的盲目性从本质上看既产生于个人对自我认知的不足，也产生于个人对自我认知的惶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是透过这种盲目性揭露社会本质的有效方案。“对于马克思而言，自我的盲目性在阶级社会也是真实的。他在《资本论》中评论道：所有最关键的社会进程都躲在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背后’。有人或许会称之为政治无意识，因为在语言领域或是社会体系的整体中，一个人的行动对于自己的意义和对于他者（the Other）的意义是不相等的。”^[3]伊格尔顿在马克思的文学批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即文学批评要关注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考察，才能进一步探究文本结构与文本意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作者可以构建出来的，而是作者受到“政治无意识”的影响，自发形成的叙述逻辑。

在深入分析马克思的文学理论后，伊格尔顿还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文学理论影响了多数后来人，不同学者在不同层面对马克思文学理论的继

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多样性发展。但囿于自身理论的局限性，研究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略显片面化。以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为例，伊格尔顿认同这部著作是将文学叙述模式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所带来的文学效果。同时，伊格尔顿指出，威廉斯的叙述逻辑始终无法抛开他旧有的“文化传统”观念，这导致他很难彻底理解工业经济发展给人类生存空间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威廉斯的书中最难令人信服的章节是研究城市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投射出对城市的国际化经验的兴趣，但这毕竟不是威廉斯实际生活的要紧方面，所以他对此的了解可能仅限于观念上……他尝试着界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者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4]在伊格尔顿看来，威廉斯虽以文学形式呈现了农村与城市在资本国际化影响下的转变，但威廉斯对文学批评的热情主要集中于英国文化传统以及这一传统给人们提供的“文化共同体”幻象上。

在威廉斯之后，伊格尔顿还深入分析了葛兰西、本雅明以及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通过对比研究，伊格尔顿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利弊得失。关于葛兰西的理论，伊格尔顿认为，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葛兰西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5]。在英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直接推动了以安德森、霍布斯鲍姆、霍尔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产生。这一现象消解了以威廉斯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的影响，“经验”“感受”“时间”不再成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从结构主义批评视角来看，第一代新左派将文本的各种形式与意义混淆在一起，致使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丧失了批评和指导功能，恰当的做法应该将文学批评解释成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伊格尔顿强调：“阿尔都塞的反经验主义当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证形式的重要纠正，但付出了陷入



新康德主义的代价，使‘真实’成为话语（discourse）外的一个灭点。他的反历史主义以及他所反对的时间性的高分化理论，都是极有用的，可产生的效应却是将历史叙述瓦解为局部‘关联（conjunctures）’。”^[6]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影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各种对立关系，自我与非自我、感性与理性、中心与边缘等对立关系均受到质疑。任何一对矛盾所构成的权力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下都变成了可以互相转化的对立面，同时以往那些标志性的批评对象如经验、情感、语言符号、文本结构等都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确定性。伊格尔顿指出：“在一个确定性的概念有着暴君或者技术统治论者意味的时代，一个确定的不可知论成为了美德。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本身被视作善。”^[7]伊格尔顿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坚信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可以被人们把握并形成具体的价值观念。为了消解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给文本意义解读带来的虚无化倾向，伊格尔顿强调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引入到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从而为文本的解读预设合理的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8]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借鉴和吸收，伊格尔顿逐步构建并确立了其在文学意识形态批评领域的新的理论范式。

二、作为生产方式的“文学生产”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生产，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9]“文学生产”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伊格尔顿把“文学生产”看作与一般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的文学生产过程；同时又将“文学生产”视为文学形式的集中体现，这些观点澄清了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伊格尔顿参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一般概念提出了文学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文学生产”是其理论的重要范式。传统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侧重于从文学的深层结构出发来探寻文学批评的意义，其更关注文学作品中语言结构的象征效果。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则是将文学放置在社会历史场域中来考察，以此揭示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将文学生产过程概括为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文本六个相互作用的范畴，并指出：“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也不是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达，确切地说，文学文本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10]这一观念显明伊格尔顿生产性文学理论的特质。

如何诠释文学的生产？伊格尔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在宏观层面，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的历史背景和物质基础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文学的生产性特质不是简单地总结文学作品的创作历程，而是要将文学作品看作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伊格尔顿指出，英国18世纪的《观察家》（*Spectator*）杂志和20世纪的《戏铎》（*Scrutiny*）杂志很好地印证了上述观点。《观察家》杂志作为英国早期知名的大众媒介，它不仅是城市读者通过文学批评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窗口，还是资产阶级精英为了摆脱教会和贵族权威束缚的重要媒介，启蒙主义价值和资产阶级的合理诉求都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广泛传播。伊格尔顿认为：“英国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相反，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体现，也是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11]《戏铎》杂志则刚好相反，它看似通过一系列批评文字使特定审美趣味和人文主义价值成为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实则是凭借这种观念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抵制。伊格尔顿通过对这些文学杂志的研究，从宏观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条件给文学生产带来的深刻影响。

物质基础是文学生产的另一重要基础性因素。在物质基础方面，伊格尔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指出文学生产也是一种商品生产。首先，伊格尔顿确认文学既“是一件人工产品”，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种世界观”；其次，强调文学是“一种制造业”，“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的商品”；再次，明确了作家、导演、舞台设计人员的身份，他们都是被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生产者。文学文本则是商品，读者是消费者，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学生产的整个循环过程。^[12]这里的文学生产是宏观性的文学生产，它包含文学生产、文学分配、文学交换和文学消费的完整环节。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与一般性的物质生产本质并无不同，文学生产方式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13]。虽然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种生产，文本是其“产品”，但他反对将文学生产纳入“文学社会学”的范畴，因为文学社会学主要关涉“一个特定社会中文学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图书如何出版、其作者和受众的构成、文化水平、‘品味’的社会决定因素”^[14]。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明显要比文学社会学广泛。究其原因，伊格尔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视角，将文学生产与社会历史环境、与一般生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赋予了文学生产物质性的品格。

在微观层面，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的要素环节进行了剖析。伊格尔顿主张：“艺术家运用某些生产工具——专门的艺术技巧，将语言与经验

的材料变为既定的产品。这种制造没有任何理由比别的制造来的神秘。”^[15]在这里伊格尔顿把文艺创作技巧比作生产工具，把语言和经验材料比作加工对象，而文艺作品的产生则是各个要素环节的衔接配合。伊格尔顿特别强调作家的生产技艺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作家作为生产者，其工作“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的加工”^[16]。对伊格尔顿来说，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艺在文学创作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作家的叙事风格、表达技巧以及作家对语言、符号等材料的加工则体现出各个要素环节在文学生产中的意义。

文学生产既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又具有其独特的生产性特质，即文学生产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这种艺术性和创造性通过文学形式体现出来，伊格尔顿将其概括为：“包括声音、意象、节奏、句法、格律、押韵、叙述技巧，实际上就是全部的文学形式元素。”^[17]伊格尔顿看重文学形式的重要价值，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形式的忽略。在伊格尔顿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将文学生产视为直接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观点，忽视了其他综合性因素对文学生产的意义。“作者的阶级地位、意识形态形式和它们与文学形式的关系、‘精神性’(spirituality)和哲学、文学生产技巧、美学理论等”^[18]都对文学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文学形式的重视不等于按照“形式主义”的逻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的历史境遇，必然会显得空洞化、虚无化。伊格尔顿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上来分析文学形式的作用及地位，他主张一切文学生产都有其历史时代的印记，包括文学形式也无法摆脱这种印记。

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政治效能

“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范式。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



不仅是阶级观念和政治信念，它还与日常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意味着“根本就没有‘纯’文学批评判断或解释这么一回事”^[19]，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样，伊格尔顿便以其独特的方式建立起了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领域中提出意识形态问题，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文学意识形态相融合，进而阐明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间的密切关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以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20]，体现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基本立场。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21]从根本立场来看，伊格尔顿始终秉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分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伊格尔顿却赋予了意识形态许多新的内涵，这些内涵尤其集中在文学批评领域。

在《意识形态导论》中，伊格尔顿列举了16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义。它们分别是：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特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特有的某种思想体系；有助于主导政治力量合法化的思想体系；有助于主导政治力量合法化的虚假观念（false ideas）；被系统歪曲的交流与交往；为主体提供某种立场或身份（position）的东西；受社会利益驱动的思想形式；同一性思维；必要的社会幻觉；权力与话语的连接；自觉的社会行为人为借以理解其周围世界的中介；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混淆语言的现实与现象的现实；话语封闭；个体得以建立起社会关系结构的必不可少的媒介；社会生活自然化的过程。^[22]伊格尔顿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概念所依据的界定框架大不相同，但就文学意识形态批评而言，当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结构性存在

时，文学批评应根据意识形态的结构来解析文学作品。这就是说，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意识形态不仅要关注文学的内容，还要关注文学的结构和形式。毋庸置疑，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日常生活中人们集体意识的影响，这种集体意识要求文学批评依据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伊格尔顿强调，这种变化并非完全同步，文学批评可以根据自身内容和主题的需求在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上进行自主性、选择性协调发展。如同马克思归纳的每一个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都包含了已经被取代的旧的生产方式一样，新的文学批评形式在结构上必定不是全新的，而是存在着大量残旧的叙事观念，其发展要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保持差异又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来完成。

伊格尔顿对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解，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反映出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运动中深入剖析文学批评的理论旨趣。在伊格尔顿看来，若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式中构建出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还必须弄清楚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意识形态为人类提供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文学向人类提供的则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经验。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推动人们自我认知、自我学习，从而让人们学会在复杂、高深的理论场域中进行概念分析，而文学在参与这场意识形态的分析时又与意识形态保持了距离。文学让人们可以感觉到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文学无法让人看清意识形态背后所隐藏的真理，就像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不可能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以科学的叙述方式向人们提供资本主义的信息和知识一样。

归根结底，伊格尔顿向人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想象性和创造性特质，从内容上看，文学是所有具有价值意义的作品的集合体，而意识形态则为文学评价的标准提供了尺度。“如果把文学

看作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那么把文学说成只是人们随心所欲地想要称为文学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因为这类价值完全没有任何随心所欲之处：它们植根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于是，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揭示了文学并不在纯粹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他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23]因此，文学意识形态批评从功能上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如果脱离社会环境去做价值判断，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很容易陷入极端化、机械化的想象。将文学意识形态批评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相结合，文学作品所涉及到的价值判断便不再抽象，它指向文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结点，文学意识形态批评亦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批判实践，亦所谓“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性的”^[24]批评。

伊格尔顿从“文学生产”到“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建构既有英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因素，又有欧陆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这种复杂的文学理论背景使得伊格尔顿善于从不同文化和思想市场中寻找契合自己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批评关系的论述是十分巧妙的。他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还把文学生产看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步过程，认为文学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物质生产属性。不过，伊格尔顿关注的重点一直停留在文学批评领域，较少地从经济基础出发全面阐释文学批评的历史变迁，这也意味着伊格尔顿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作为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

论，特别是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所共同指向的“政治批判”功能在伊格尔顿那里也得到了建构。

注释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第439~440页。
- [3]【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54页。
- [4][6]【英】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王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第101页。
- [5]【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郭国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29页。
- [7]【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宋政超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 [8][9][12][13][14][15][18][21]【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第81页；第65页；第66页；第75页；第2~3页；第18~19页；第9页。
- [10]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Verso 1980, p. 64.
- [11]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Verso 1984, p. 80.
- [16]【德】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态》，王炳钧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 [17][24]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3; p. 184.
- [19][23]【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 [20]【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页。
- [22]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Verso 2007, p. 1-2.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凤翔